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20 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编

8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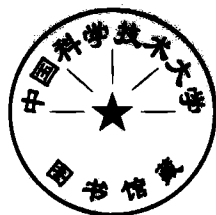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20 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编

8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周振甫

对编辑工作的老生常谈	振 甫(2)
编辑·学者·专家	周振甫(6)
钱先生的教导	周振甫(14)
耕耘在古籍园地里的周振甫	王知伊(17)
五十二年均勤恳,编审书稿都精心 ——记中华书局编审周振甫	常振国(20)
见周振甫先生	王钰鑫(23)
谦虚谨慎 编著等身 ——小记编辑大家周振甫先生	张世林(26)
印须我友 ——记一代名编辑周振甫	黄 伊(37)
老编辑家丰采 ——访周振甫先生	王 昶(45)
周振甫教我做编辑	常振国(47)
存目	(49)

姜椿芳

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	姜椿芳(52)
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姜椿芳(56)
在父亲身边的日子里	姜尼娜(62)
怀念父亲	姜岩(72)
姜椿芳同志献身百科事业的精神永留人间	吕东明(75)
悼念敬爱的师长——椿芳同志	黄鸿森(77)
中国现代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姜椿芳	黄鸿森 张曼真(79)
姜椿芳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周志成(94)
姜椿芳与狄德罗	黄鸿森(99)
永恒的遗言 ——回忆姜椿芳同志	金常政(108)
存目	(111)

胡乔木

出版工作是神圣的工作	胡乔木(115)
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	胡乔木(128)
关于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的信	胡乔木(144)
胡乔木零忆	韦君宜(148)
胡乔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	刘志荣(156)
乔木同志关怀出版工作	王益(161)
缅怀乔木同志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宋木文(164)
胡乔木编辑思想对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意义	周永光(174)
胡乔木同志和副刊	袁鹰(191)
乔木同志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	于友先(204)
胡乔木期刊出版思想初探	吴乐平(207)

百年大计 育人为本

- 胡乔木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 宋应离(213)
- 乔木同志三谈《白求恩》的编辑工作 章学新(219)
- 存目 (226)

邓 拓

- 欢迎“杂家” 邓 拓(230)
- 文章长短不拘 邓 拓(231)
- 奉告读者 邓 拓(234)
- 是简化字还是错别字呢 邓 拓(235)
- 邓拓办报 陆 灏(237)
- 邓拓与《老百姓》 张正光(248)
- 从《燕山夜话》学习邓拓的办报思想 成 美 顾 行(251)
- 邓拓与《前线》的办刊思想 李 筠(267)
- 巨星陨落在“文革”序幕中 苏双碧 王宏志(272)
- 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 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访谈 任 捷(288)
- “三家村”与北京出版社 周应鹏(302)
- 邓拓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金 钊(312)
- 存目 (323)

何其芳

- 毛泽东指导我撰写《不怕鬼的故事》序 何其芳(327)
- 忆《不怕鬼的故事》 弥松颐(333)
- 何其芳与《工作》 卞之琳(337)
- 与其芳同志的一夕谈 熊道光(343)
- 何其芳同志与1946年重庆的文学活动 苏 执(349)
- “以自己的心温暖他人的心”

——何其芳的编辑生涯	蒋勤国(356)
感念何其芳同志的扶持	炼虹(363)
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型编辑家——何其芳	王一如(365)
存目	(372)

金灿然

反对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出版者

——评“时代百科小丛书”	金灿然(376)
为古籍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金灿然	何双生(383)
金灿然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	俞筱尧(386)
回忆灿然同志	李侃(395)
追怀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	邓广铭(410)

一代史学家与出版家的革命情谊

——记翦伯赞与金灿然的交往	张传玺(415)
以诚待士三十年	

——一个政治工作者的回顾	王春(424)
--------------------	---------

忆昔午桥桥上饮

——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张国功(434)
存目	(439)

周振甫

周振甫(1911~2000),学名麟瑞,浙江平湖人。1931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2年进上海开明书店,做校对工作。帮助宋云彬校对了《辞通》后,又校对了王伯祥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和《汉书地理志详释》,为编辑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后陆续编开明版《中学生丛书》中的《班超》、《东汉党锢》,注释了《开明活页文选》,撰写了《严复思想述评》。1948年,担任钱钟



书《谈艺录》的责任编辑,为这部书加了提要性小标题,深得钱的好评。出书后,钱曾赠言:“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铢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随开明书店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从事古典文史哲著作的编辑工作。1971年到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作编辑工作,1987年获首届“韬奋出版奖”。

周振甫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善于古典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在长达50年的编辑生涯中,他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编辑工作经

验,编辑的书稿有吕思勉的《中国史》、《先秦史》、《秦汉史》;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管锥编补编》;夏承焘的《唐宋词选》以及《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等。此外,还参加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明史》的点校工作和新版《鲁迅全集》部分注释和定稿工作。其本人的主要著作有:《文心雕龙今译》、《文心雕龙注释》、《鲁迅诗歌注》、《诗词例话》、《毛主席诗词浅释》等。

对编辑工作的老生常谈

振 甫

1932年秋天,我到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所工作。我怎样到开明书店去的呢?原来海宁朱起凤先生著作了《辞通》,这部书是搜集了很多可以相通的或相同的不同写法的辞,把它们汇集起来,说明它们相通的原因。这些辞都是从古书中搜集来的。这部稿子原名《读书通》,投给商务。这是一部大书,当时的商务的总经理是王云五。大概他认为这部大书不能赚钱,拒不接受。这部书就投到开明书店。开明的经理章锡琛看到了这部大书,觉得这书名为《读书通》,销路不会广,怎样改一个能吸引读者的名字,就想到《辞通》。《辞通》的名字既符合书的内容,又好像同《辞源》是相类似的,而《辞源》是非常畅销的。这样把名字一改,就可能打开销路。再说,这本是有分量的书,即使出这本书要亏本,但它可以提高开明的地位,亏本也是值得的。再说,这部书是商务怕亏本而不肯接受的,以当时国内最大的书店商务不肯接受的稿子,开明竟肯接受,这也是向商务显示力量,就决定接受了。这部书引的全是古书,因此把朱起凤先生的学生宋云彬先生也请进来,负责校对。后来宋先生要给开明函授学校编讲义,又要替开明《中学生》写历史小品像《玄武门之变》,《辞通》的校样就不免积压,因此想找一个

人来帮他校对。当时,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就写信给我,问愿不愿意进开明。我那时正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念书,接信后就表示愿意。开明就让我给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断句。他们看了我的断句,认为可以,这样我就进了开明。

在开明,先帮宋先生校对《辞通》。不久,开明要出一套中学生知识读物,拟了一批选题。我担任写《班超》那本小册子。我把《后汉书》全读了,稿子写了,开明审了一下,认为可以,就出版了。后来这套书销路不好,没有出下去。现在看来,由年轻的编辑参加编书,是给予锻炼提高的一个好方法。假如编辑只顾审稿,不参加自己编书,对编书的甘苦缺少体会,审稿水平也不容易提高。经过自己编书,自己找资料,考虑对资料的选择剪裁编排改写。在这方面取得经验,再来审稿时,就会注意到审稿中怎样核对资料,看稿件对资料的取舍组织有没有问题,会提高审稿的水平。现在回想起来,开明在这方面工作是做得不够的,一是指导不够,二是要求不严。让年轻的编辑编书,应该给予指导,指导他从多方面去找有关资料,这样来丰富他的知识,来帮助他学会做研究工作。开明在这方面根本不管。第二,对年轻人写的东西,应该提出严格要求,帮他提高。这方面开明也没有做。后来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很少了。

《辞通》校对完了。我曾经在王伯祥先生领导下参加《二十五史补编》的校对工作。《补编》的书目是由王先生拟定的。拟定以后就去搜集书稿,多数是旧书,也有少数稿件。搜集后就批好格式付排,没有什么编辑工作可做。只是当时编印了一些《补编》所搜集的书的内容提要,寄到北京,引起了顾颉刚先生的赞赏,那可能符合他的爱好,并不说明这些提要写得好。在校到其中一部吕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著作时,发现他对水道有不少胡说,请示王先生,由我写了一篇跋,指出他的胡说,这也许可算做了点编辑工作吧。在给童书业先生校对《春秋史》时,给他提了点意见,他接受了,写了复信。他要求把我的去信和他的回信作附录刊在书后,这也算

做了点编辑工作吧。

当时对投稿或无名作家的稿件才审读、提意见。对有名的学者或作家的书是不需要审读就付排的。所以只能在看校样中发现问题向作者提意见。

当时的编辑有两种：一种是专职的，一种是以别的身份来做编辑的。后一种的编辑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高。地位高，不由于他是编辑，是由于他不光是编辑，还有另一种身份。比方叶圣陶先生，他是编辑，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高的，那是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教育家，又是著名的语文学家。要是光做编辑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就比较低。因此，傅彬然先生说：编辑好比裁缝，把各种材料搜集剪接编排。这是对编辑各种资料说的。又说：编辑好比跑龙套。龙套围着主角转，这出戏里替这位主角跑龙套，那出戏里替那位主角跑龙套。编辑围着书稿转，看这本书稿时围着这本书稿转，可能要找和这本书稿有关材料来核对参考；看那本书稿时又围着那本书稿转。因此，编辑好比清朝章学诚说的书贾的横通，他对他所处理的各种书稿也知道一些，可是这些知识缺乏系统性，不可能对某一方面做专门研究。编辑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高。当时稿件的采用权不由编辑决定，由上面决定了交给编辑处理的，不发生编辑扼杀稿子的事。

当时，开明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教科书，教科书以外的书当然也要出，但不是主要的，所以出多出少关系不大。因此，不考虑拟定选题，向各方面约稿。

解放后，我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那就要定选题、约稿、审稿。在这些工作中，要是领导的意图体会得不明确，工作就不好做。记得通俗读物出版社有一位编辑来向我约稿，写一本小书。题目定了，他要我拟个提纲；提纲交上去，他也同意了；稿子写好后，他提了意见，做了修改。他准备发稿了，送交领导签字，领导一看说不对，就作废了。原来领导要求是从语文角度来谈，这位编辑

没有搞清楚,让我从读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谈,就不合要求了。还有,一部书稿,从拟定选题、约稿,到稿子写成,经过审稿,有时领导不放心,还要送外审,再退修,复审,批准,发稿,稿子发到出版部还要排队,到送交排字房,还要排队,等排出来又要校对,三校签字,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时,等不到发排,一个运动来了,气候变了,稿子就搁起来了;有时,已经排出清样,运动来了,不能印了,只好拆版。有时,书印出来了,运动来了,成了批判的对象。稿子约来了不能出,出来了挨批,这给编辑工作造成困难。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编辑工作也不好做,可见安定的重要。

后来,我到中华书局去参加明史点校工作。明史的点校工作,本来由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领导几位同志一起搞的。初步点校工作已经完成,只有一些志还没有校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这工作中断了。到一九七一年再继续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时没有请郑天挺先生等参加。等到改写的校勘记排出来以后,再请郑先生和南开其他同志看,他们有意见,要修改。在校样上改,给工人造成很多困难。现在看来,当时在校勘工作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明史》的志说,问题多的是《地理志》,《地理志》该用哪几种书来校,事前没有讨论,后来在引用什么书上发生问题。哪些该校,哪些不该校,事前也没有讨论。在这方面要是事前讨论明确了再动手,或者发稿前把稿子交给郑先生审定,也不会引起后来的麻烦。

这样看来,做编辑工作先要体会领导意图,体会得越明确越好,从选题到约稿到审读提纲,最好都能取得领导同意,免得组来的稿子不符合要求。拟定选题时,要了解一下读者对象的需要,不要闭门造车,要出门合辙。适合读者需要的书,才能起到为读者服务的作用。审稿子还是要围绕着稿子转,看看同样性质的书,目前已经达到什么水平。手中的稿子,同目前已经出版的同类性质的书,比较起来怎样,有什么特色。在知识性方面有没有问题,在表

达上有没有问题。在看稿前,对稿件内容的有关知识要做初步了解,要是自己对这方面知识掌握不够,要向人请教,在审稿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样才能做好审稿工作。由于书稿的内容多种多样,对审稿的要求也不一样。但要注意,自己的知识有限,在审稿中要吸取有关知识,找同类性质的书来做比较,在审稿中提高自己的审稿水平,做好审稿工作,这大概是一致的。

审稿是重要的一步,但校对也很重要。有时稿子内容没问题,书印出来有错字,看了很不舒服。校对由校对同志负责,但编辑也有责任。中华书局最近出了一本书,作者姓“范”,在封面上印成“範”字,原来这本书用繁体字排,管封面的同志把“范”看作是“範”的简体,要改繁体,给改错了。有一本书,是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先生著作的,在版权页上排成高亨,虽然版权页的字小,不显著,看了也很不舒服。因此,校对很重要,校对除了由校对同志校正外,编辑也要校;有时很普通的错字,校时会滑过去。所以除了校原稿外,还要通读,通读时会把普通的错字读出来。

对编辑工作,我实在谈不出什么来,只有老生常谈罢了。

原载《编创之友》1981年第1期

编辑·学者·专家

周振甫

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工作时,同傅彬然先生在一起。记得傅先生曾经讲过,做编辑的围绕着著者的书稿转,今天围绕着这部书稿转,明天围绕着那部书稿转,好比跑龙套,今天围绕着这位

主角转,明天围绕着那位主角转。傅先生说这段话,他的含意是说,做编辑的,一般说来,知识比较杂,不像著者对他所著的书稿做过专门研究。编辑对他所审读的书稿,既不像著者那样有专门的研究,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尊重著者,要向著者经过专门研究的书稿学习。还要提高自己审读书稿的水平,参考有关的书籍。但我国古代的著名编辑,却不是这样。《汉书·艺文志》说: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刘向、刘歆父子做的就是编辑工作,他们应该是古代最大的编辑了。他们是当时第一流学者。当时还请“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是请当时各科专家来校读各科专门著作。清代章学诚著了《校雠通义》,实际上是讲编辑学的书。他在叙里说: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泝源,以想见于文集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又在《原道第一》里说：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师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的校讎，即编辑，不仅要汇集各种版本，校正脱误，编成定本，写出对各本书的评价，还要研究各书在学术上所处的地位，研究先秦到汉代的学术流变，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结合图书目录写出从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史来，不是深通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是写不出这样的著作的。章学诚的《校讎通义》，即编辑学，认为编辑所要做的工作，从版本、校勘、审读加工、定本到学术评价、学术史的演变都包括在内，少了一项就无法完成编辑工作。因此，编辑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学术研究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像刘向做的对每书的叙录，刘歆做的《七略》，都是经过研究所产生的著作，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样看来，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的编辑工作，只是围绕着著者的书稿转，谈不上研究，谈不上评价，比之古代大编辑刘向、刘歆的编辑工作真是不可同年而语，所以傅先生把它说成跑龙套了。

当时的编辑工作也不光是跑龙套。1934年，叶圣陶先生写了《十三经索引自序》，说：“十二年（1923年）春，余始业编辑，编辑

者,采录注释耳。”叶先生到商务印书馆去做编辑,他做的是采录注释。大概在国文部编注了几种选本,像《苏辛词》、《周姜词》、《荀子选》等。这个工作,相当于文学研究所之选注《诗经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商务的编辑工作,还包括编《辞源》,相当于语言研究所之编《现代汉语辞典》。商务里把这种解放后研究所里做的工作都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照刘向、刘歆的编辑工作看,完全合适。他们做的编辑工作,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远远超过编选注本和辞书之上。不过刘向、刘歆的工作当时不称为编辑,就编辑这个词看,顾名思义,把研究所的工作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是合适的,把现在编辑室里主要的审读加工工作称为编辑反而显得不够。颜真卿《干禄字书序》:“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可见编著成书,相当于研究所里的采录注释工作,才是编辑;现在编辑室里的审读加工工作,只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即在编著成书或采录注释以后的一步工作,把这一步工作称为编辑,反而有以偏概全的不足。

叶先生在商务里做的编辑工作,相当于文学研究所里的编选注本。叶先生在开明书店里做的编辑工作,还包括著作。像叶先生替开明书店编的一套小学教本,这套教本完全是叶先生写作的,即使其中有的课文是有所根据的,也都经叶先生改写过的。再像叶先生编《中学生》,《中学生》需要一部用故事体写的长篇连载的讲写作的书,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就由叶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合写,即刊在《中学生》上的《文心》,这也属于叶先生编《中学生》的编辑工作。把这种著作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就刘向、刘歆的编辑说,刘歆的著作《七略》是专门著作,这部专门著作是为他的编辑先秦到汉的图书服务的,只有写定《七略》,才完成他的编辑工作,所以《七略》的著作也应该包括在他的编辑工作内。章学诚指出他的校讎,就包括《七略》在内可证。叶先生的著作《文心》,正

是编辑《中学生》的需要,所以《文心》的著作也该包括在编辑《中学生》的工作内。抛开《文心》,专就《七略》来说,只有完成了《七略》的著作,才能完成刘歆的编辑工作,《七略》的著作,是包括在刘歆编辑工作之内的,也是他的编辑工作的一部分。

二

现在再来看看跑龙套的编辑工作,围着著者的书稿转,要做好这样的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行,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来做好编辑工作。这里还有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要做些补充工作。比方有一部《文史通义校注》,其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开头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陆九渊),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戴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戴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看了这段叙述,发生几个问题:一,一般认为浙东学术与朱熹、陆九渊不同,朱熹、陆九渊讲性理,浙东学术讲经世致用,这里对这个主要区别为什么不谈?二,浙东学术既与朱熹、陆九渊不同,这里为什么把浙东学术说成出于朱熹、陆九渊?这篇里的浙东学术究竟指什么?对这三个疑问,《校注》里都没有讲。围绕着书稿来做编辑工作,不能不对这三个疑问考虑一下。一般认为朱熹讲“道学问”,陆九渊讲“尊德性”,都是讲性命性理的。金华吕祖谦有中原文献之传,讲明治体;永嘉陈傅良讲政制治法,叶适讲经世济用;永

康陈亮研究立国的本末方略。他们同朱熹、陆九渊不同,称浙东学派。可是章学诚在《浙东学术》里,不提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却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但浙东的袁燮、袁肃、袁甫都推崇陆九渊,不违反朱熹的教导。又讲到王守仁提出“致良知”,刘宗周本致良知提出慎独;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开创万斯大、斯同兄弟的经史学,发展到全祖望的经史学。本篇的注释,对以上的应该注的词语都作了注解,但对以上提出的三点疑问没有说明。《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上》全祖望案语:“乾淳(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可见浙东学派与朱、陆两派成三分鼎足之势,那末《浙东学术》里只讲浙东之学渊源朱熹,尊崇陆九渊,显不出浙东学派的特色,也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讲。那样的注释没有注意到读者会产生的疑问。原来章学诚的《浙东学术》,称“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他并不排斥朱、陆两派讲天人性命的道理,他主张天人性命不当空讲,一定要跟史学结合。因此他不赞成南宋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派,尤其是陈亮,称:“举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抵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是排斥朱、陆讲性命的,所以他不讲南宋的浙东学派。他讲的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即讲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到全祖望的浙东学派,他们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陆九渊、王守仁。王守仁推崇陆九渊,讲性命还讲“六经皆史”,正符合“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主张。章学诚讲的浙东学术,从黄宗羲以下,他们讲史学不排斥性命,不同于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术。这样一讲,才把上面的疑问解答了,这篇的用意讲明白了,可见围绕着著者转的编辑工作,也离不开探索著者的学术思想。编辑跟学术思想的探索还是分不开的。

下面还举两个例,说明围绕着书稿转的编辑工作,还是离不开对学术的探讨。我在参加《汉文学史纲要》注的审读时,看到一段讲《诗经》的原文: